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及当代启示*

杜利娜

【内容提要】 消灭阶级压迫与剥削，进而消除贫困与两极分化，实现整个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毕生的愿望。正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促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深刻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本质和制度根源，并为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实现解放指明了方向。在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贫困治理的制度基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脱贫壮举，创造了奇迹；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减贫扶贫事业奠定了丰厚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发起脱贫攻坚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基础，也为全球贫困治理作出中国的贡献。

【关键词】 马克思 贫困理论 精准扶贫 中国共产党 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杜利娜（199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是一部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并逐步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面对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无产阶级整体性贫困问题，马克思立足无产阶级立场，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的贫困理论，指出只有从制度上进行变革，铲除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基础，才能最终消除贫困，只有“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①，“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②，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放眼全球，当今世界虽然物质财富已经极大丰富，但仍有数十亿人口在贫困中挣扎，中国也还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亟待脱贫。这说明，物质财富的绝对增长并不必然消除贫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贫困问题的批判并没有过时，对当前我国的贫困治理乃至世界贫困治理依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无疑，马克思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贫困，与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贫困问题具有根本性区别。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的，对无产阶级的贫困却采取漠视态度。因此，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无产阶级贫困的再生产。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此前单一的公有制模式，逐步放开对私营经济的限制与禁锢，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并变革了以往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些做法，在一时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造成了贫富分化问题。换言之，我国当前的贫困问题，与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联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17ZDA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系,与一些分配上的不公有联系,同时也与一些地方生产力发展落后有联系,在这些方面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贫困现象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反贫困路径的构思,对于分析我国的贫困问题,推进新时代的扶贫事业,对于解决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构建贫困理论的无产阶级立场

马克思消除人类贫困的“初心”,可以追溯到中学阶段。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①。后来,在伦敦贫困交加的政治流亡经历,坚定了马克思为人类求解放并消除贫困的决心。可以说,正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促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深刻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根源。

1. 马克思构建贫困理论是从对贫困现象的感性认识开始的

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②。正是出于为无产阶级摆脱贫困而奋斗的阶级立场,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针对莱茵省议会判定穷人捡拾树枝为盗窃行为,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犀利地抨击普鲁士专制统治对贫民的剥削与欺压,维护农民权利。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驳斥了那种把代表特殊利益看作浪漫主义的观点,指出:“代表特殊利益会消灭一切自然差别和精神差别,因为这样做会把特定的物质和特定的奴隶般地屈从于物质的意识的道德、不理智和无感情的抽象物抬上王位,用以代替这些差别。”^③由于当时的马克思立足于纯粹理性主义的国家理性立场,对贫困问题的思考局限于对所谓国家、法律等抽象的法哲学范围,因而对农民贫困问题根源的分析不免陷入“从主观到主观”的苍白困境。但正是面对普鲁士政府的黑暗统治,促使马克思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正视社会贫困问题。

此后,青年马克思开始从国家行政管理层面挖掘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原因,控诉官僚特权阶级对劳苦大众的欺压与剥削,并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进行集中论述。马克思指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其贫困原因必须从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因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状况”。然而,与马克思的批判相反,普鲁士管理机构却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这种贫困状况的原因同它的原则和行动无关。不仅如此,面对贫困群众的呐喊与求助,官僚机构还大加指责,声称处于贫困境地的人们带有“图谋私利”的恶劣动机,过分夸大了对贫困问题的描述,就连他们提出的申诉和请求也是“对国家法律的无理的、有失恭敬的指责”^④。可以说,正是出于对贫困农民的同情和对普鲁士专制统治的痛恨,马克思开始深入思考贫困问题,并逐步形成了对贫困问题的理论观点。

2. 对贫困问题的认识由感性认知上升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毕生的使命就是为人民解放而奋斗。对林木盗窃法等问题的思考,促使马克思在认识到缺乏实践基础的纯思辨哲学对解决现实问题的局限性,以及理性的法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后,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

② 参见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390页。

始注重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思考社会问题。面对普鲁士官僚机构的狡辩，马克思指出：“国家中某一地区的经常性的贫困状况……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但是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①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把管理机构即国家的管理不善，视为社会贫困的原因，还通过分析普鲁士官僚制度的落后性、腐朽性，为贫困问题提供了经济、制度批判的切入点。正如1895年恩格斯在《致理查·费舍》中所说：“正是他（马克思——引者注）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②可见，对人类幸福和社会正义的追求，是马克思毕生的奋斗目标，正是出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使得青年马克思在对社会贫困问题的关注中，揭开了覆盖在社会问题上的理性主义面纱，开始思考社会贫困与国家、制度间的内在关联。

尽管当时的马克思尚未形成成熟完善的唯物主义理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不可避免地停留在理性主义层面，致使他只是表露出为受压迫的贫苦人民寻求法律帮助的迫切愿望，并未触及产生贫困问题的根源，但彼时的马克思已逐步萌生了对黑格尔式理性主义国家观的不满，并开始摆脱唯心主义狭隘性与片面性的束缚。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思辨的法哲学，认为现代国家置现实的人于不顾，只是“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③。此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贫困问题开始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3. 对无产阶级贫困根源和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秘密的科学揭示

对普鲁士专制统治的深刻批判，以及坚决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立场，激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罪恶的批判，深度揭示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和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通过考察分析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致命危害的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为了糊口，不得已过度劳动，在精神和肉体上异化为机器，且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富裕，“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 and 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此时，马克思开始看到贫困问题的本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也就是说，造成工人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异化劳动”，因为“异化劳动把自由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④。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要么受到劳动的折磨（出卖劳动力），要么忍受贫困的痛苦（当他们被无情取代或沦为产业后备军时），否则他们就会丧失生存的手段甚至资格。

此外，马克思还通过考察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批判了“工人完全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⑤的荒谬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忽略了贫穷的社会性，掩盖了工人阶级的贫困是源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通过对私有制与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⑥。由此可见，马克思论证了异化劳动如何让人陷入贫困境地又与人的本质异化，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不单单是物质的匮乏，同时也是对人的本质的扭曲。正如他所指出的：“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棚舍。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124、16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190页。

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① 马克思不仅看到了无产阶级在经济层面的贫困遭遇，而且据此分析了无产阶级同样极度贫困的政治、精神和文化生活。

总之，正是由于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无产阶级悲惨的现实，驱使马克思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根源，进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贫困的根源。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制度批判及策略思考

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和资本》《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通过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现实的考察，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本质、规律及制度根源，并据此作出治理贫困的思考，从消除贫困，到实现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以制度变革来消灭阶级剥削和发展生产力等贫困治理路径，从而形成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高度统一的贫困理论。该理论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生产目的，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贫困化是不可根除的痼疾，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贫困问题才有望根除。

1. 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社会根源

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批判了经常在资本与劳动、政治经济学与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的小资产者——蒲鲁东及其为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辩护的改良主义思想，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即“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②。此外，马克思还批判了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上简单套用黑格尔辩证法的错误做法，例如他宣称平等是原始意向、天命目的的思想，并把机器看作分工的反题，从分工中推论贫困的混乱逻辑等。此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提出了“雇佣劳动”概念，旨在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必然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化。1847年出版的《雇佣劳动和资本》既是对上述两本著作研究贫困理论的发展，也标志着马克思开始注重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贫困问题。

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以工资为切入点，展开对资本及其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工人阶级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必然结果。通过讲明工资以及商品价格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进入了研究的核心概念——资本。他认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劳动的创造物，资本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接着，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即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但是，资本与雇佣劳动根本不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相反，“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因为，工人不只生产产品，他们还生产资本，“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通过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③。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揭示了资本家如何巧妙地利用工资这一障眼法，剥削工人创造的除了劳动力价格以外的价值。对工人阶级来说，那种以社会地位降低为代价换来的工资增加和物质生活改善，只能导致“横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④。由此，工人阶级陷入贫困成为必然。最后，马克思还通过分析生产资本增加对工资的影响，指出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利，往往采取分工细化和改进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6、734、72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34页。

器的手段。然而，分工细化后劳动的简单化以及机器使用的范围扩大，导致工人只能通过激烈竞争存活，以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就像森林似的越来越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越来越消瘦”^①。

2. 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制度根源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事实，对资本主义剥削下的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总结。他明确指出，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内在原因及制度根源；贫困问题因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因而，贫困问题的解决必将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覆灭。

首先，马克思考察分析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困的状况与性质。以棉纺织业为例，马克思考察了英国棉荒历史时期，工人所遭受的由机器带给他们的“极端贫困”“饥饿待毙”“工资低微”“威胁解雇”^②等悲惨遭遇，分析了在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过渡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如何通过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工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来大量生产价格便宜的产品，把工人工资降低到仅够糊口的最低限度；资本家如何培育出大量处于后备状态的贫困人口，使其或者被迫遭受非人的劳动摧残，或者丧失劳动资格而穷困堕落，“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③。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困状况的分析可见，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对资本家而言是财富积累的历史，对工人来说却是贫困积累的历史，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抗争史。

其次，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作为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理论支点。剩余价值的发现，揭示了资本家占有的社会财富不是所谓资本的功劳，而是对工人阶级血汗的榨取，是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作为马克思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剩余价值论超越并推翻了古典经济学坚持的“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④错误观点。

马克思指出，正是资本家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导致了工人阶级沦为机器、陷于贫困。为阐明剩余价值与剩余价值规律是导致资本主义贫困化现象不可根除的内在原因与基本规律，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一方面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一方面导致的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因为“资本是死劳动，它就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⑤。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增长的关系是成正相关的，资本积累的动机源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由此，资本积累的趋势必然是通过采用先进技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则是造成资本家大量榨取剩余价值使工人阶级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

最后，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贫困的重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其丧失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被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农民丧失土地等生产资料，逐渐沦为劳动贫民的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8-4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7、260页。

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总之，正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迫使农民变成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从而导致那些丧失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只能依附于资本，并被资本驱使增加异己的敌对力量，伴随着资本财富积累的扩大沦为贫困人口。

通过上述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及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制度性根源。

3. 马克思指明了无产阶级整体脱贫的方向与路径

马克思不仅指明了资本主义贫困化的制度根源，还从消除贫困，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制度改革、发展生产力和消灭阶级剥削等贫困治理路径，为无产阶级指明了整体脱贫的实践方向，形成了旨在消除贫困和贫富分化，最终实现人类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

第一，把制度改革作为贫困治理的首要前提。马克思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现实考察与逻辑论证，指向了更深刻的制度批判，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作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资本家不仅不满足、不止步于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反而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资本积累，更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榨，导致两大阶级间的矛盾对立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由此，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以资本主义制度的覆灭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首要前提条件。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制度，符合社会发展的生产关系，才能对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才能促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新的社会制度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第二，把消灭阶级剥削作为贫困治理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的剥削之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同时，资本主义的高生产率和倒行逆施的发明、发现，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免除极度贫困的任何保障，以至于资产阶级的关系狭窄到不能容纳它本身造就的财富。

由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贫困化是资产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而消灭阶级剥削则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的同时，必然要消灭阶级以及它本身的阶级统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中的一切人免受阶级统治的剥削、压迫之苦，保障社会财富的均等分配，即随着“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①，现行社会的种种弊端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将被彻底根除，工人阶级贫困化问题也将不复存在。

第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贫困治理的根本手段。“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的基础。”^②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就是利用较之封建社会更发达的生产力，创造出了庞大的财富，同时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赤贫。因此，无产阶级要摆脱贫困化的命运，也必须抓住生产力这个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建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里实现人人享有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三、马克思贫困理论对我国贫困治理的意义

马克思以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的贫困治理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贫困治理工作，为人民谋幸福的理论依据。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工人阶级的深度贫困，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不再是雇佣劳动，劳动力也不再是商品，从而生产资料和货币也不能成为资本，这就不可能出现类似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那么也就不应该有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了。但由于受历史条件所限制，我们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我国实施的是与这一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只要我们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工资形成和劳动力流动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而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劳动力又成了商品，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与货币又成了资本。”换言之，我国当今还存在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既然如此，那么“马克思当年从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角度来探索阶级对立的基本思路对我们就有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①，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与解释力。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当前贫困问题只是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矛盾的表现，只有经历艰苦卓绝的改革、发展生产力及扶贫实践，社会主义贫困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1. 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贫困治理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批判，深刻说明了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首要的就是要从推翻剥削、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开始，也就是说，只有铲除造成贫困的制度性根源，才能为根治贫富两极分化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打牢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进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贫困治理事业的艰辛探索，为我国消除贫困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性保障。

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毛泽东科学分析了中国贫困问题的原因，讲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消除中国贫困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指出，中国要摆脱贫困“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因为，旧中国受尽帝国主义欺凌的现实表明，新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只能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②。在确定新中国发展方向后，1949年2月，毛泽东指出，要“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来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

为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不可撼动的牢固地位，毛泽东提出要“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以革命的手段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地位，从而改善民生，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辟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旨在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中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满足人民日

① 陈学明：《论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9、2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2、1437页。

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中国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为我国消除贫困奠定了最根本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不仅为新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更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为广大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由于高估了中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毛泽东设想的以生产分配高度集中、商品经济占比极小等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未彻底铲除中国的贫困现象。但事实证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物质基础极其薄弱、广大人民文化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毛泽东带领广大人民进行的贫困治理实践，帮助中国迅速摆脱了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初步满足了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依然离不开社会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制度之根本。总之，从制度根源着手消除贫困的贫困治理实践探索，是新中国治贫实践的伟大成功，拉开了中国扶贫减贫事业的序幕，也为世界各国治理贫困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2. 把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作为贫困治理的根本策略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一方面批判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制度原因，另一方面指明了贫困作为历史范畴，是不发达社会的特有病症。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继承、发展马克思贫困理论和毛泽东有关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贫困的道路、政策以及步骤，既以马克思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反贫困的基本条件，又创造性地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以改革开放为战略抓手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贫困治理的根本策略。

邓小平深知，国际封锁、生产力水平落后、高度集中且日趋僵化的计划体制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依然没有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指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能够打破旧的体制机制对生产力发展的约束，为中国贫困治理事业提供新的发展动力。而改革和开放又必须首先从农村做起，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② 所以，邓小平把农村生产经营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在全国试点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村工作的重要政策，激活、发展农村生产力，并取得了明显成效。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改革生产关系，调动农民积极性。但是对于到底采取何种形式问题，邓小平认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在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为突破口的改革思路基础上，邓小平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中国贫困治理事业找到了出路。

只有开放国门，中国才能与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接轨，才能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因此，邓小平提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③ 的思想，并在实践上把开放沿海城市作为与外国交流，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窗口，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之下，我国城市、沿海地区乃至全国都开始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197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6175亿元，完成计划101.5%，比上年增长8.5%，国民收入（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8、117、23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6页。

业和商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净产值)达到337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①。

总之,改革开放打破了当时造成我国贫困问题的制度性瓶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为中国的贫困治理事业注入了鲜活动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摸索形成的改革开放和贫困治理战略,帮助数亿人脱贫,提升了十几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基本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拦路虎”,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当前我国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经验。

3. 把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的攻坚之举

当前,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经过持续努力,“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②,但贫困问题依然是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瓶颈。为进一步破解阻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贫困难题,习近平把马克思贫困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创新发展了新时代我国扶贫思想,开启我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战略举措,“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③。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注重综合性扶贫,着力解决治理内生型贫困等问题。为此,一要树立精准扶贫的理念,切实把扶贫对象搞精准、把扶贫主体搞精准、把扶贫路径搞精准、把扶贫措施搞精准,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二要改变大水漫灌、“手榴弹炸跳蚤”的工作方式,“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只有明确靶向、精准施策,转变“面、线、点”的贫困治理路径为“由面到线再到点”,才能真正实现脱贫致富。

增强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贫困治理的目标并非只是通过外力帮扶贫困人口暂时脱离困境,而是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具备发展经济、提升收入意识和能力。内因决定事物变化发展,造血能力远比输血重要,原因在于只有发展好内在动力,贫困治理的效果才能得以长期稳固,贫困地区的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指出:“要使自身生产力水平同外部支持力量相结合以发挥最佳效益。”^④可见,贫困治理的重点在于内因,外因只能起到推动作用,激发脱贫内生动力与活力是精准扶贫战略的关键点。贫困地区只要抓住机遇,理清思路,找准主攻方向,选择好符合自身实际和时代要求的发展路子,发挥好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创新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要害在于制度弊端,只有进行社会制度革命才能从根源上消除贫困,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存在制度根源性的缺陷,但诸如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就业、教育、养老等不完善的体制机制,是造成贫困问题堆积的重要原因。习近平高度重视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对实现精准扶贫的重要作用,指出必须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制止贫困治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把顶层设计与加强基层探索结合起来,不断完善有利于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快速发展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从体制机制层面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以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为打赢脱贫攻坚战革除障碍。

扶贫要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扶贫必须要“扶文化”,根本手段是发展教育。保证扶贫帮困的

① 国家统计局:《197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cn.chinagate.cn/economics/2007-03/01/content_2368148.htm。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页。

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122页。

④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6页。

具体落实，必须重视提高贫困对象的文化素质，增强他们脱贫致富的能力。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①，振奋贫困地区群众的精神斗志，提升他们的综合文化素养。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勤劳致富的理念，逐步使扶贫工作从“输血型”扶贫到“造血型”扶贫转变，既是党和政府扶贫工作的方向，也是贫困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根本途径。只有引导贫困地区人民切实转变等、靠、要的落后心态，鼓励他们树立自强不息、勤劳致富的脱贫意识，才能阻断因教育不足和思想落后造成的贫困代际传递，才能防止返贫现象发生。

总之，解决贫困问题是个历史性、世界性难题。马克思站在为人类谋求解放与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造成的贫困问题展开了深度批判，为各国无产阶级摆脱贫困进行了制度变革思考，为社会主义治理贫困提供了科学指南。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贫困治理贯穿于我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为新中国消除贫困指明了前进方向，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警示，而这些理论与实践经验则为新时代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坚实的实践基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扶贫减贫问题，矢志不渝地带领全国人民与贫困现象作不屈斗争，引领中国人民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进而“强起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消除贫困问题上最真切、最深刻的体现。为了兑现这一庄严承诺，我国开启了空前规模的精准扶贫工作，并立志“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②。有理由相信，在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指导下，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贫困治理事业必将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5]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9] 陆汉文、黄承伟：《中国精准扶贫发展报告（2017）：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10] 蓝红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慢性贫困问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

（编辑：汪世锦）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8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7、48页。